

# 开国大典天安门大红灯笼的制作

姜仲华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大红灯笼，2019年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报记者 李冰洁 摄

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着的8个大红灯笼格外引人注目。

当然，开国大典悬挂的大红灯笼意义非凡，为了能在比例上匹配天安门城楼宏大的体量，让灯笼烘托出喜庆的气氛，它们背后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展现了出色的才艺和过人的技巧。

## 里面能蹲三四个人打扑克

1949年9月，焕发新生的北京喜气洋洋，开国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9月2日，周恩来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此时的天安门城楼仍需修缮，装饰悬挂的毛泽东画像、正面的两条字幅、城楼上的灯笼，都需要现做。画像、字幅都还容易解决，灯笼却令所有人头疼。天安门城楼原有的六角宫灯，既小又破，落满灰尘，根本无法适应“张灯结彩”的主题。

天安门上的8个大红灯笼由张仃和钟灵二人负责设计。张仃是著名画家，负责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工作；钟灵是著名美术家，曾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是中南海政务院总务办公室主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请示汇报，同时也参与一些设计工作。

钟灵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天安门的会场布置，当时有明确的分工：城楼两旁的大标语、会议的横幅、红旗、大灯笼等由我们会场布置科负责；天安门前、观礼台、车队、升国旗的设备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张致祥主任负责；阅兵式、包括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放礼炮等由聂荣臻负责。我和张仃教授事先绘制了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图样，包括大典图标、两旁的标语、八个大红灯笼、两边的八面红旗等。”

张仃和钟灵在中南海瀛台东海岸的三间平房“待月轩”里进行设计。天安门城楼上共9个开间，中间一间最大，也是大厅的出入口。张仃、钟灵决定此房间不挂灯笼，以便留出更开阔的空间。两侧各4个房间，逐渐缩小，每个开间要悬挂一个灯笼，共8个。他们发现每个灯笼的直径接近3米时，整体效果才能和天安门雄

伟、雍容的气势协调。这么大的灯笼，史无前例。钟灵开玩笑地对张仃说：“这灯笼做出来，在里面可以蹲坐三四个人打扑克！”

张、钟二人设计好大红灯笼的图纸后，去提请周恩来批准。周总理在图纸上用铅笔批示“同意”，后面签署了一个“周”字。

## 天安门城楼上扎灯笼

设计好了，然后就是制作。因为灯笼之大前所未有，制作难度不可预料，而且用在开国大典这样的盛典上，要求极高，不能出任何失误，工期又短，钟灵等人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找人制作，竟没有一个灯笼师傅敢承担这项工作。经过反复寻找，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一家“永顺成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和灯笼的作坊，找到一位领头的工人师傅——尹作滨。

尹作滨，20世纪初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马集镇尹庄村，因家境贫困，11岁逃荒去北京，拜著名手艺人张玉宽为师。尹作滨虽没读过书，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筋想办法，在制作家具、灯笼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凭着一手精湛的手艺，尹作滨在北京成家立业。

尹作滨看了设计图纸，知道是开国大典用在天安门上的，非常激动，对灯笼的具体要求进行反复思考后，

自信地拍着胸脯对钟灵说：“请放心，我一定能把灯笼做好！”

当时商定，由钟灵备料，尹作滨带几个徒弟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考虑到灯笼太大，作坊里摆不下，制作完成后运输也是难题，尹作滨建议在天安门城楼现场施工，钟灵同意了。

尹作滨带着几个徒弟在天安门城楼上制作灯笼，他的儿子尹盛喜只有十来岁，每天都从家里提着饭送到父亲身边，在旁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没承想30年后，他竟成了北京城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在前门卖起了大碗茶，还开了家名扬全国的“老舍茶馆”，这是后话。

（作者单位：山东省齐河县委政协文史委）



大红灯笼的制作者尹作滨

尹作滨虽然扎过无数个灯笼，但是这样大的灯笼，还是头一次，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有时对着图纸和铁棍、竹片、红纱等材料苦思冥想，有时被竹片划破手指鲜血下滴也不在乎，有时因为想出好办法而喜形于色，有时儿子叫他吃饭他恍若未闻，完全进入一种全身心投入的状态。

## 最耀眼的灯笼

开国大典前几天，周恩来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这时，扎制8个大红灯笼的工程已接近尾声。钟灵向周恩来介绍了尹作滨的制作情况，周恩来亲切地向尹作滨伸出手，尹作滨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非常激动，赶紧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汇报制作灯笼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勉励他和徒弟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干好。

经过尹作滨和徒弟夜以继日的工作，8个大红灯笼终于如期做好，每个灯笼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每个重约80公斤，外罩红纱，体量巨大，饱满圆润，骨架以铁棍和竹片做成，坚挺结实，完全达到预想的效果。

这8个大灯笼是当年中国最大的灯笼，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灯笼，见证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浴火重生，开创新纪元。此后的日子里，这8个大红灯笼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一个又一个重大的事件……

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北京天安门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天安门城楼进行装修。其中，城楼上的4对8个大红灯笼宣告退役，被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按照摆放位置，8个大红灯笼的编号分别为东一、东二、东三、东四和西一、西二、西三、西四。东一号和西一号因靠近天安门的中轴线，作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藏。天安门管委决定将东二号和西二号这对旧宫灯进行“无底价拍卖”，筹措资金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作者单位：山东省齐河县委政协文史委）

## 陈独秀爱桐城

周二中



曾在央视一套播出的46集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第九集中有个镜头：青年刘少奇来拜访陈独秀，陈独秀为刘少奇泡茶，刘说不用客气。陈独秀颇为得意地告诉刘：“这可是我家乡的桐城小花，其品不亚于龙井，你得尝尝！”

桐城小花是产自安徽桐城的优质茶叶，明清时作为贡品，特贡朝廷，属于中国历史名茶，《桐城风物记》中亦载桐城小花“品不减龙井”。清人姚兴龙《龙眠杂忆》载：“桐城好，谷雨试新焙，椒园异种分迥前，石鼎连枝取霍英，活火带云烹。”写的就是桐城小花。陈独秀不是桐城人，而是与桐城相邻的怀宁人，但自古以来“桐怀一家”，不分你我，所以陈独秀说桐城小花是他家乡的名茶，也不为过。

陈独秀喜爱桐城小花，除了受地域因素影响外，毕竟桐城、怀宁是一体，鸡犬之声相闻，往来密切，桐城还是陈独秀外婆家。更重要

的是，陈独秀受桐城文化影响非常大。陈独秀与桐城方家沾亲带故，桐城人方守敦是近代较有声望的诗人、教育家、书法家，当年曾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助力吴氏创办桐城学堂，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

1939年，方守敦去世，陈独秀还送去挽联：“先生已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表达了对方守敦的尊重和对自己遭遇的不满。陈独秀与桐城人潘贻化关系也不一般，潘贻化与青楼女子张玉良结婚，陈独秀是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张后来被誉为“中国西洋画界第一流人物”，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茶不仅是日常饮品，更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特产，相互沟通交流的媒介，陈独秀与桐城的关系难分难解，桐城小花为他所喜爱不难理解了。

## 郭沫若过生日

周惠斌



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1941年适逢他50虚岁，同时也是从事文学创作第25个年头。在周恩来的创意策划下，中共南方局准备在重庆为他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

10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前往郭沫若家中，提议由文艺界联合举办“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庆祝活动。郭沫若听了后委婉辞谢，周恩来表示：“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月15日下午2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所在地，先行召开纪念茶话会，当晚又设宴聚餐，提前一天庆祝、纪念郭沫若的生日和战斗业绩。

11月16日早晨，《新华日报》推出《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揭开了当日庆典的序幕。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

头，并在头版发表了专文《我要说的话》，全面总结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地位及其战斗经历，首次公开将郭沫若同已故的文坛巨擘鲁迅联系在一起。

下午1时，800多位各界名流集聚在中山一路中苏文化协会内，隆重举行“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十寿辰纪念茶会”。大会主席冯玉祥致开幕词，作家老舍报告了活动的筹备经过和纪念计划，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中央军委政治部副部长梁寒操、参政员黄炎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苏联大使馆代表丕赞诺夫等分别致贺词、贺诗或演讲，一致推崇郭沫若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最后，由周恩来和张申府致祝词。

面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朋友的热情庆祝、殷切期盼，郭沫若感奋不已，在答谢词中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惭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策。”

## 汪曾祺泡图书馆

崔鹤同



1939年夏天，汪曾祺来到昆明，寄住在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宿舍里。他以第一志愿考取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在学校发了榜还没有开学的一段日子里，他除了骑马、坐船游玩之外，几乎每天去翠湖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不大，形制有点像道观，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了好多盆白茶花，安静而欣然地开着。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也从不开言。他来了，开了门，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8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

图书馆的藏书在楼上。楼板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按当时昆明人的

叫法叫作“飞子”，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当啷”，木盘就沿着滑车吊上去了。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就装着你要的书下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方法，汪曾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不少，而且有些善本，能够满足汪曾祺的需要。过了两三个小时，那位干瘦而沉默的图书馆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12点：下班！

汪曾祺他们对这种以为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他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他们的看书，是有目的的，是逮着什么看什么，到这里来是享受一点安静。

翠湖图书馆是汪曾祺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图书馆，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 曹禺讲戏剧

杨建民



翻译家许渊冲在抗战中考入“西南联大”。“联大”大家如云，就连请来讲课的老师，也多有专长的一方名家。譬如，在读“大一”时，他就听了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一堂课，并留下深刻印象。

曹禺此时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职，他来“联大”上课，应属讲座。所以，一堂课中，几乎涉及戏剧创作的多个方面。譬如他首先说：第一要多搜集材料。曹禺形象地说：创作如十月怀胎，搜集的材料不一定可用，但灵感来了就用了。因为人生复杂，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曹禺举有一例，说一个人做官几十年不得升迁，怕人瞧不起，所以每有人请吃饭，他总是先在家吃碗蛋炒饭，才姗姗赴宴。在席面上吃不上几口，便推说自己还有应酬，又安步当车回去。到家再吃一碗蛋炒饭了事。终于得了个“蛋炒饭”的外号。曹禺认为，类似的人物情节应当多多搜集，以利创作时用。

接下来，曹禺讲了自身的一段故事。他说10年前，曾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现在已经成了3个孩子的母亲。

曹禺与她见面，只谈一些油盐菜米，直到送他出门时，女友才指着自己女儿问曹禺：你看她还像十年前的我吗？曹禺听出弦外音，忙回答：你现在并不老呀！似乎没直接回答女友的话，却回应了她话中的意思。高明！曹禺告诉学子，这种意味深长的对话，应当注意搜集。

此外，曹禺认为，人物不要写得大典型化。这一点与今天大学教的《文学概论》的观点不大一致：大坏的汉奸和大好的爱国青年都很少见。也就是说，人有多层面，简单的非此即彼定义既不现实，更不符合创作规律。他还认为，对话应当是白话，不是文言。曹禺的好对话有例证：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在客厅，主人偷偷问仆人：“没有来吗？还？”这才是生活中的对话。曹禺称这样的对话不合逻辑却鲜活，是出人意料的对话。最后，他还认为运用方言“要紧”。因为方言最能打动当地人的心，引发他们的感情。

由以上几条可见，曹禺对语言尤其看重。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许渊冲的听课记述中，我们应更加留意从语言角度研究曹禺，这是把握其艺术特点的一把钥匙。

## 百年老照片背后的华侨故事

魏宁当 口述 本报记者 照宁 整理



1930年海沧石塘谢氏华侨公司赠予槟城谢氏公司“乡公所保卫团”照片

治动荡，福建军匪患严重，地方颇不安宁。旅居世界各地的300多万华侨，运用经济力量，以各种形式开启救国救乡运动。海沧（史称海澄三都），地处同安、龙溪、海澄交界处，三不管地带，因侨胞海外打拼取得成就，成为盗匪抢劫的目标。侨胞苦于“走千里风浪卒，数十年心力

无非为事父兄贻子孙计，岂能皆入盗囊”，海内外侨亲早在1896年就创立海内外对立的三部联络局组织，守护家乡安宁和支援家乡地方建设、开展社会公益事业。

闽南地区自1918年被军匪大肆敲剥，故乡山河弄得不可收拾。菲律宾侨胞过半数是生长于闽南的，不忍桑梓之



这幅照片拍摄于1930年2月26日，由当时的厦门海沧石塘华侨谢氏公司赠予马来西亚槟城石塘谢氏公司惠存，现保存于马来西亚槟城“世德堂公司”文化资料中心。

“两地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乡”，一张照片两地情。100多年前，海沧石塘自治乡公所民团全副武装整装为守护乡民，合影留念赠予海外侨亲留念，给漂洋在外的亲人一个念想。海沧、槟城两地“谢氏”民间侨团创立已有200年的历史，侨亲密切来往，但祖地原保存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焚毁。该照片是目前能够找到唯一见证海沧海内外侨胞携手救国护乡的历史照片。它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闽侨救乡会”开展的“救国救乡运动”，海外侨胞捐款，家乡组织民团，武装守护家乡平安的事迹。

查阅《民国时期福建华侨史料汇编》，正值辛亥革命成功，但国内政